

# 从北到南与自东徂西

——中国文化地域差异的考察

周振鹤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以南北的地域差异为主流,近代以来,由于先进的工业文化由沿海向内地的传播和辐射,已逐渐形成了东西地域的文化差异。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过去似乎没有足够的认识,在解放以来的头三十年中,甚至还过急地想要消除这种差异,结果反而对全国整个现代化进程起了阻碍的作用。

回顾一下历史上我国文化地域差异的变迁过程。对于今天制定与执行现代化的战略方针,或许不无好处。

## 农业文化重心从北到南的转移

中国古代史是一部农业文化发生发展兴盛衰落的历史,小而言之也是一部农业文化重心从北到南转移的历史。在铁器未曾发明的远古,黄土高原的土质松软,易于耕种,自然成为中华文化的摇篮。即使到了战国时代,人们把九州大地的土壤分成九等,黄土高原的土壤依然被认为是上上等,北方的其他地区则分别为上中等、上下等和中三等,而南方——即淮水秦岭以南地区都是下三等<sup>①</sup>。从气候来看,秦汉以前也是南不如北:“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北方气候凉爽,雨水虽少但集中,於旱地作物勉强够用。因此自远古直到秦汉一统时代,北方的农业文化得到有利的发展。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方面都对南方显出压倒的优势。

当着夏商周三代崛起于北方之时,南方并没有同样水平的政权出现。接着在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列国林立,政治中心密布,而南方先后只有楚、吴、越三国。这一时期百家争鸣,学派林立,但是几乎所有的名人都出在北方,孔孟、老庄、申韩、扬墨、孙(武)吴(起)、管(仲)商(鞅)、苏(秦)张(仪)无一不是北方人。南方则只有屈

原、范蠡等凤毛麟角。

秦汉时期,北方已形成关中与山东两大农业经济中心。尤其“关中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而南方楚越之地却“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在农业社会里,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人口数量是农业文化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西汉元始二年(公元二年)的人口统计表明南北人口比例为1:3.2。就人才而言,两汉时代的三公九卿,儒林文苑人物也都集中在北方,南方近乎空白<sup>②</sup>。因此,秦汉盛世的文化可以说是北方为主的文化。

虽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南方的农业经济也在逐步向前发展,但是速度很慢。例如牛耕技术直到东汉时期才传播到淮南地区<sup>③</sup>。然而魏晋以后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大大加速了南方的开发过程,使南方的农业文化水平不但赶上而且超过北方,实现了文化重心由北到南的转移。

从东汉末年到两宋之际,北方曾经出现过几次大动乱,边疆游牧民族入据中原,迫使黄河流域人民南迁到淮汉、长江以至闽岭以南地区,又造成几度南北政权分裂对峙的局面。南迁的人民不但给南方增添了大量劳动力,而且带来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移民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快速传播的过程。同时,分裂的政权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也要积极发展经济。这两个因素都促使南方的开发速度比正常的一统时期要快。

在南下的移民长河中,有三次蔚为大观的浪潮,使南方农业文化的发展出现三次飞跃。第一次大移民发生在西晋永嘉丧乱之后<sup>④</sup>,南来的北方侨民大都集中在淮水以南、太湖以北地区,使江淮地区的农业文化在东晋南朝时期取得长足的进步,将三国东吴以来南方已经加速开发的势头更加推向前

进,以至时人将江南比作昔之关中:“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之地,亩直一金,鄂、杜(长安附近二县名)不能比也。”但其时北方在十六国的混乱之后,也相对安定百余年时间,使黄河流域传统的优势继续向前发展,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农业文化尚未完全赶上北方。南北朝之后,隋唐重又建立一统宇内的大帝国,黄河流域重新得到繁荣,关中仍称沃野,南北方文化都臻于昌盛。天宝初年,南北户口之比达到四比五之谱,双方相去不远。盛唐文化堪称南北共荣的文化,而北方仍略占优势,如唐前期北方进士人数就明显多于南方。<sup>⑤</sup>

但是“渔阳鼙鼓动地来”,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将北方诸道化为千里萧条荒无人烟的灾区,大批难民蜂拥至淮汉以南地区,形成了第二次移民浪潮<sup>⑥</sup>。这次大移民散布面比第一次要宽,在苏南浙北、江西北中部和鄂南湘西北三个地区都集中了相当数量的移民。南方农业文化的发达从江淮一带向西扩展到中南地区,因此唐后期,“每岁县赋入倚办,止于浙西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sup>⑦</sup>换句话说,整个淮水以南至秦岭以北地区成了维持唐后期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

农业经济的发达,促进封建文化水平的提高。荆州在唐前期的科举中从无一人中式,时人号为“天荒”。唐后期大中年间始有刘蜕其人以荆州解及第,遂称为“破天荒”,以后接连数人得中进士,荆州于是号为“衣冠藪泽”。南方文化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已足与北方文化抗衡。北宋初年的人口统计表明南北户口之比已为三比二,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五代末期,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得以恢复发展,但通观北宋一代,南方的经济力量已经完全超过北方,所谓“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尤其“东南诸郡,饶实繁盛”,所以中央政府一直执行“竭三吴以奉西北”的方针。南方的人材也日见其多,以文学而言,南方的词人比北方多出一倍。但是从整体来看,南方的文化还不能完全凌驾于北方之上。首先,开封和洛阳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南方尚无城市可与之颉颃。其次,高层政治人物在北宋前期一直是北人为多,到后期这一现象才有所改变;道学儒林人物也是北方超过南方(南北为四与七之比)。理学三派,洛学,关学都在北方,只有濂学在湖南。此外,在商业方面,北方之发达不让

南方,单开封一地,崇宁间商税年收入就达四十万贯,如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丰富多采的市民生活也是南方城市所不及的。

但是靖康之难消除了北方仅有的一点优势,使文化重心完全转移了南方。靖康元年,金人南侵,宋王室辗转南逃杭州,大批各阶层的北方人随之南迁,形成第三次移民浪潮,使南方文化再度加速发展<sup>⑧</sup>。苏南浙江聚集移民最多,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至为迅速。尤其苏杭,人称天堂,繁盛之貌,国际闻名。苏浙以外,福建、江西、湖南以至岭南地区,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相反,在北方,由于战争的影响经济受到破坏,文化日见萎缩。即以人才而论,南宋在经学、史学、文学、地理学方面都有众多杰出人才群体的涌现。道学派别除北宋的关洛濂学以外,又有闽学、陆学(在江西)和浙东学派的繁荣。仅以道学儒林人物为例,宋史所载南宋著名学者有四十五人之多,而金史却连道学儒林二传亦不立。南北封建文化水平的高下十分明显。此时之南方文化已经完全压倒北方,恰与春秋战国时相反,北方人才已是月落星稀。

金宋以后的元明清一统王朝,除了政治中心依然在北方而外,经济文化重心已经固着南方不可移易了。元代“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南北差距更日益扩大,明代全国三十五个工商业城市,就有二十四个在南方;明初科举,南人中式的十倍于北人,以至不得不采用南北分卷制,以勉强维持南北人数的均衡。所以到清初,顾炎武评论北方文化的衰落时说:“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一曰人荒。”地荒是物质文化的退步,人荒是精神文化的不如。与顾炎武的话相映成趣的是康熙帝的诗句:“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藪。”以财赋而言,明代苏州一府垦田数不足全国的九十分之一,而税粮的征收却几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人文论,有清一代江苏状元约占全国一半,而苏州状元又近乎江苏的一半。更重要的是著名学者——包括先进思想家和乾嘉考据派绝大多数都是南方人。其中对中国思想界起着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如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代中叶的经今文学者和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派龚自珍、魏源等人均出自苏、浙、湘诸省。因此可以说,与秦汉文化相反,明清文化是南方为主的文化。

要之,南宋以还,封建的农业文化重心已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完成这个转移的全过程从东汉末年至

两宋之际,历时八百年。到了清代中期,农业文化本身也已经发展到自己的顶峰,走到了尽头。“康乾盛世”以后的衰落不是有清一代的衰落,而是整个中国农业文化的衰落。嘉道之际,西方工业文化已经从海上屡次叩击中国的大门,然而我们这个过于成熟的文化仍然满足于“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自给自足型的小农经济,并无改弦更张之思,不愿意主动实现向工业文化的转型。然而,鸦片战争终于使西方文化直接与东方文化发生撞击,工业文化与农业文化产生的冲突,使沿海地带首当其冲,并被迫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向内地传播和辐射这一巨大的冲击波。

### 工业文化自东到西的传播

以失败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开始步入了近代。这以后的八十年历史进程,表现出极端错综复杂的面貌。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对我国人民残酷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农业文化,在外来的工业文化冲击下缓慢地被改造和同化。我们既不愿象日本那样忍受一时之痛实现这一转型,便只好蒙受长期的屈辱,被迫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曲折地从沿海到内地逐步地实现这一转型。所以中国近代史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页工业文化由沿海向内地蔓延、渗透的历史。

西方列强要求中国实行开放的直接目的,首先是通商贸易,因此在以南京条约为始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中,不断地要求增辟通商口岸。由沿海地带到沿长江一线,由边境到某些内地城镇,至五四运动前夕,各类口岸已达九十二处<sup>⑥</sup>。通商口岸的增多,一方面表明帝国主义侵略程度的加深,另一方面也说明西方文化影响范围的扩大。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香港的割让和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个通商口岸的开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除了在东南沿海增加台南、淡水、汕头和琼州(今海口)四口外,还向北方沿海和长江沿线延伸,开辟了天津、芝罘(烟台)、牛庄(营口)和汉口、九江、镇江等六口。此后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沿海口岸越来越密。温州、北海、拱北三处相继开辟,长江中游的宜昌、重庆,下游的芜湖也辟成口岸,于是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形成了以沿海一线和沿江一线为骨架组成的丁字形的通商口岸体系。

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帝国主义

一方面将通商口岸向内地推进,一方面又掀起了割地狂潮,沿海良港大连湾、胶州湾、威海卫,广州湾以及九龙半岛均被强行租借。这些通商口岸(包括其中的租界)和租借地组成外国资本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孔道,同时又成为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撞击点。尤其是沿海的口岸,在作为贸易中心的同时,又是西方文化的展览橱窗,也是新式的工业基地,还往往是新思想、新知识和新事物的策源地(当然另一方面也往往是罪恶的渊藪),因而这些口岸在向内地渗透、传播工业文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是1986年国务院宣布对外开放的十四个城市,除了连云港和南通外,全在这些沿海口岸和租借地中。

南京条约的签订,虽然只是打开一条门缝,但是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立即侧身而入,在东南五口建立起他们的滩头阵地。思想敏锐的中国人从西方的工业文化与传统的农业文化的鲜明对照中触发了后来称之为改良主义的最初念头,王韬正是这些人的杰出代表。1848年,他二十一岁,从江苏长洲老家来到上海。在震惊于先进的西方文明之余,他写了《瀛壖杂志》一书<sup>⑦</sup>。该书的第六卷几乎是西方文明的一曲颂歌,从邻舍西妇的缝纫机到墨海书馆的印刷车床,从精利的火器到便捷的电报,从博物馆到新闻纸,以至洋楼、路灯、照像、戏剧无不极口称赞,心向往之。十年以后,比王韬年长的冯桂芬也到达上海,在这里写出了著名的《校邠庐抗议》,提出了包括《采西学议》在内的一系列维新变法建议,这无疑也与他直接和西方文化的接触有关。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的郭嵩焘,五六十年代之际也在上海居留过,显然也是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对其先进性产生了深刻的认识,而成为晚清最不为顽固派所容的先进思想家。通商口岸作为西方文化橱窗的这一作用是很明显的。

作为贸易中心,通商口岸把中国市场纳入了世界范围,并逐渐改变我国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洋货从口岸深入内地,农产品从内地输往口岸的体系,直接刺激了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例如咸同年间,因为出口丝茶之利,浙西“山乡亦皆栽桑”,素不养蚕的江苏高邮、江浦、昆山等县以农兼桑者也不可胜计。福建武夷山区的茶叶也“漫山遍野愈种愈多。”<sup>⑧</sup>与此同时,洋纱、洋布的进口又打击瓦解着农村家庭的手纺业,动摇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

作为工业基地,从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就非法在通商口岸设立各种小型近代工业。上述的墨海书馆就是其中的第一家,于1843年设在上海。到1894年为止,这样的企业共有101家。其中大半在上海,其余在沿海各口岸,沿江口岸所占比例较少。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下,从七十年代始,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也开始出现,1872—1894年,这样的工业有74家。这些工业虽然大多在沿海地区,但已不限于通商口岸,有向内地发展的趋势,北京、杭州、慈谿、建宁,甚至远至太原都已各有一家。

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洋务派官僚创办的民用新式工业,有的在内地有的在沿海。在内地的工厂往往从沿海地区招收熟练工人。左宗棠在兰州创办制呢局,即向广东招请技工,从福建调来技术人员<sup>⑫</sup>;张之洞在湖北办缫丝局,(这个局原来要办在广东,随张之洞调职而到汉口)也从上海及江苏、浙江招募有经验的女工<sup>⑬</sup>。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在华投资办厂成为合法。通商口岸的外资企业急剧增加,从1895—1913年,至少又有136家外资或中外合办的工厂和矿山出现。除煤矿位于直隶和东北外,其他企业都集中在上海、北方的通商口岸和奉天(今辽宁)。民族资本工业在同一时期也发展得很快,创办了549家商办和半官方的制造工业和采矿业。其中468家非采矿企业有239家设在通商口岸,229家设在内地,大约各占一半。显示了现代化进程由沿海到内地的传播。当然,在资本和规模方面,通商口岸的企业要比内地大得多,论资本,内地企业只有通商口岸的一半,差距很大;论规模,差别更大。在1900—1910年间,上述华资工厂中雇用500人以上的企业很有116家,其中沿海省份占去104家,内地只有12家,这12家中还有8家是在武汉<sup>⑭</sup>。换句话说,内地几乎没有较大规模的企业。

近代工业的出现,还造成了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打破了农业文化中士农工商四民的格局,朝着人的现代化的方向迈进。工人分布的地区差异是很显著的。1884年,仅上海、汉口、广州三地就集中了工人总数的78%<sup>⑮</sup>。在1900—1910年间沿海省份500人以上的大工厂(矿山不计)工人总数为十万左右,而内地(包括武汉)一万五千人而已。若去掉武汉,则不足三千人<sup>⑯</sup>,两者悬殊极大,这种集中程度化现象是沿海内地差异的重要表现。

伴随着工人阶级的兴起,沿海地带还出现了一

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改良主义者,近代科技学者和语言文字改革者。他们绝大部分都出生在沿海省份,活动和经历又都在沿海的城市里。如冯桂芬是江苏吴县人,王韬是长洲人,薛福成是无锡人,马建忠是丹徒人(受教育于上海),何启是广东南海人(受教育于香港),他的合作者胡礼垣是三水人,郑观应是香山人,陈虬是浙江乐清人。

与改良主义者同时,另有一批知识分子,积极追求格致之学——即近代科学技术,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近代科技人物,其中的佼佼者有浙江海宁的李善兰、慈谿的张斯桂,江苏无锡的徐寿父子和华蘅芳,上元(今南京)的管嗣复,松江的韩应陞。徐寿宁可放弃功名,孜孜不倦于物理、化学试验,试制轮船和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并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等人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管嗣复则甘愿以每月十五两的薄薪受雇于传教士医师,为的是“求西学”,而且颇耐人寻味的是他的父亲竟然是个闭关绝市的倡言者。<sup>⑰</sup>

稍后,还有一些人热衷于文字改革。创制各种拼音方案,企图改造艰深难懂的汉字,以达到开民智的目的。最早的是卢懋章,福建厦门人,1878年就写出了《一目了然初阶》。接下来的四个人都在1897年出版了他们各自的著作,他们是蔡锡勇,福建龙溪人,毕业于广东同文馆;沈学,江苏吴县人,久居上海;王炳耀,广东东莞人,居香港;力捷三,福建永泰人。这五位文字改革运动的先驱,不但全出身于沿海,而且除力氏一人外,都受过新式教育。<sup>⑱</sup>

上述这些知识分子无疑都受到西学的深刻影响,但直到九十年代,他们的活动范围都还仅限于沿海沿江地带。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朝野震动,群情激愤。人们这才明白,不但西方文化本身是强大的,而且连西方文化的复制品——日本文化也竟然是强大的,于是结论只能是:只有向西方学习才是出路,于是以变法维新思想为代表的一切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知识一拥而从沿海进入内地。学会林立,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人描写当时内地湖南省的情形说:“湖南风气日开,较江海各省,有过之无不及也。”<sup>⑲</sup>

由沿海向内地传播的还有西方的教育制度,其中以美国教会创办的大学影响最为明显。十九世纪上海有圣约翰书院(1879,圣约翰大学前身),山东有广文学堂(1882,齐鲁大学前身),北京有汇文大

学(1888),通州有华北协和大学(1889,两校后合为燕京大学)的创办,本世纪初又有苏州东吴大学(1901),武昌文华大学(1903),广州岭南大学(1904)及圣约翰大学(1905),北京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05),上海沪江大学(1906),南京金陵大学(1909),杭州之江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武昌华中大学(皆1910);长沙湘雅医学院,福州华南女子大学(皆1914),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5),福州协和大学(1918),北京协和医学院(1920)的建立<sup>⑩</sup>。这些大学的创办自然是彭明昭著的文化侵略行为,但在客观上却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当是时,中国的大学不过只有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三所。这些教会大学将当时美国大学中的系科设置,课程安排,教学方法以及管理方式引进中国,这种强制的文化输入提供了新型大学的样板,又是对传统文化教育的一种批判。

沿海和内地的差异不但体现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方面,在思想意识,价值取向方面,也显出不小的鸿沟。这里只取两例以资对照。浙江定海县在舟山群岛上,因两次鸦片战争陷于敌手而闻名,这个僻居海岛的县城,“在海通以前,敦尚朴素,渔盐耕读,各安其业”,“迨商埠既辟,遂相率而趋沪若鹜……光宣以来商于外者尤众”,“于是风俗丕变,不重儒,应科试者少,士子多志在通晓英算,俾他日可得商界高位。”价值观念改变的结果是,全县所有男丁中,业盐渔农传统三业者只占一半,而业商,业工与其他职业及在外埠谋生者亦占一半<sup>⑪</sup>。定海偏僻小县尚且如此,沿海他县可想而知。但是在内地,尤其是北方的内地,风气则迥然不同,河北晋县离石家庄只有五十公里,不算太偏僻,但是该县在清朝复亡十多年后仍然留着长辫,直到1928年,该县县长明令禁止垂辫,而且亲自到各处剪发,才算把辫子肃清。至于缠足陋习则“牢不可破,虽有放足会下乡查勘,而一般乡曲细民仍秘密缠足。”<sup>⑫</sup>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二三十年,而内地保守依然如此,其在清末民初之落后可推而知之,正与沿海一带的开放、外向精神成一鲜明对照。

由沿海内地传播的西方文化,不止于上述这些内容,但已足够说明西方文化入侵的结果,并不只是体现在现代工业的数量和规模方面,而是一场由表层物质文化到深层精神文化的改造过程。如果将西化东渐以来,我国社会的变化过程略作小结,似可

将近代八十年划为三个阶段:在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变化仅限于东南沿海五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三十年,变化扩大到南北沿海及沿长江一线;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变化才逐步向内地城镇推进。而广大的内地农村,则到本世纪三十年代还没有根本的变化。八十年来,我们从对西方文化的茫然无知到认识其物质文明的强大又进而发现自己制度的不行,到最后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怀疑,于是爆发了五四运动,揭开了现代史的帷幕。

从总的方面来看,近代的八十年里,现代化的进程是很慢的,但毕竟在沿海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变化,造成了沿海与内地的文化差异。现代史的头三十年,这种差异在某些方面似乎更加深了。这一点仅从现代工业和城市分布两个方面就可作一简单的分析。

在现代工业方面,1937年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沿海六省及沪、津、青岛、威海、南京、北平六市的工厂数占全国(除东北外)的80%<sup>⑬</sup>,其中沪、苏、浙三处又占56%,上海一地则独占1/3。若以城市而言,1933年六大城市:上海、天津、武汉、无锡、广州、青岛的厂家占全国的39%,资本数占59%,生产总数占69%,工人数占54%<sup>⑭</sup>,沿海与内地差距之大由此可见。

在城市方面,到三十年代,沿海一线已经兴起了一连串的港口和工业城市,从北到南有大连、营口、秦皇岛、天津、烟台、威海、青岛、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除了广州和福州在晚清作为广东和福建的省会,是较大的城市外,其余城市都是近百年发展的结果。它们当中有的原来只是一般县城(如上海、天津),有的只是县级以下的小港口(如烟台、汕头),甚至只是小渔村(如大连、青岛)。这十四个城市经过通商口岸或租借地的共同经历后,成为工业文化的基地。

在传统文化中,一省的省会是其唯一的政治中心,同时也往往是唯一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新的沿海城市的出现打破了这个老框框,先以经济文化中心出现,而后才卷入政治旋涡。因之在沿海省份中造成了二元或多元的中心,如辽宁的沈阳与大连,河北的保定与天津,山东的青岛与济南、浙江的杭州和宁波、温州,福建的福州和厦门,广东的广州与汕头。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北京(或南京)与上海的二元中心。

这些城市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布局,在

沿海地带形成一条经济文化发达的走廊。无论它们的形成过程是如何地该受诅咒，但是它们的出现必定在将来要成为新的现代化进程的出发点。

## 沿海地区必须先行现代化

回顾南北文化差异和沿海内地文化差异产生的过程，可以发现，产生差异的原因都与外力刺激有关。从北到南的农业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因为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压迫，从东到西工业文化的传播则起因于西方资本主义从沿海的入侵。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结果是为我们的农业文化所同化，因此南北文化之间没有质的不同，只是同一农业文化中的盛衰隆替。工业文化的侵入却是要改造和同化传统的农业文化，因此使沿海和内地文化发生了质的不同。

由于传统文化抵御力的顽强，百余年来现代化的进程极为缓慢，沿海与内地文化差异的出现并不能完全消解传统的南北文化的差异，因此近代以来两种差异发生重叠，表现为南方比北方先进，东部比西部发达。解放以后我们忽视了南北的差异，又简单地把东西部差异当成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我们以北方的意识来改造南方，以削弱沿海工业的办法来建设内地工业，结果差异是缩小了，但代价却是全国现代化进程的迟缓。一九五六年以前一度减少对沿海地区的工业投资额，调出过多的工程技术人员，使沿海工业的潜力没有得到发挥，发展速度放慢，全国工业的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在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善。但后来随着备战备荒方针的贯彻，大三线小三线建设的进行，沿海地区的发展再一次受到阻碍。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方针的提出，又把沿海的经济发展放到重要的地位，使我们在闭关三十年之后又一次面向世界。特区建设，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开放，以及最近出台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都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沿海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必须再一次从沿海地区接受先进的工业文化，因此我们的确需要一个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但又不能仅止于经济战略！今天无锡一市（包括所属三县）的工农业总产值比贵州一省大得多，可是后者有三家出版社，前者却一家也没有。这种不正常现象单靠经济战略是无法解决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沿海与内地的差异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差异，那是一百多年以来积淀下来的从物质到精神文化的差异。因此我们显然必须制定比经济

战略更高一层的总体战略。

我们最终总要克服沿海与内地的差异，但现在不能，也不可能。要消除差异必须先承认差异，并利用这一差异使沿海地区先行现代化，才能带动内地也走向现代化。传统的农业文化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花了八百年时间，我们不能指望在太短的时间内，就完成现代化从沿海到内地的传播过程。在目前，最要紧的是使沿海地区先行现代化，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别无选择。

## 注：

- ① 见《书经·禹贡》。
- ② 卢云《西汉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历史地理》第五辑；《东汉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中国文化》第五辑。
- ③ 见《后汉书·王景传》。
- ④ 参见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
- ⑤ 见徐松《登科记考》。
- ⑥ 参见周振鹤《唐代安史之乱与北方人民的南迁》，《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2—3辑。
- ⑦ 《新唐书·食货志》。
- ⑧ 参见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
- ⑨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41—47页。
- ⑩ 此书至迟在清咸丰三年（1853）即已属稿，后屡经补充。参见该书光绪元年版蒋序及正文。
- ⑪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427—428、466页。
- ⑫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138页。
- ⑬⑭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954页、1169页；《上海总商会月报》第5卷，第3号。
- ⑮⑯ 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184—1189页计算。
- ⑰ 胡思庸《西方传教士与晚清的格致学》，《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
- ⑱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
- ⑲ 《湖南学会林立》，载《国闻报》光绪24年5月11日。
- ⑳ 罗荣渠《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
- ㉑ 参见《定海县志》，民国十三年铅印本。
- ㉒ 见《晋县志料》，民国二十四年石印本。
- ㉓㉔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94页、95页。